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握体系化和学理化的内在关系

●董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理论的体系化,意味着对相关的核心概念、重要范畴、基本命题等进行分类分层,形成相互关联、逻辑自洽的框架结构,让理论呈现为有机统一的整体;理论的学理化,意味着对相关的基础性概念、规律性认识、原理性成果等进行学科性、学术性研究,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原理,彰显理论的彻底性和穿透力。体系化是学理化的重要目标和成熟标志,学理化是体系化的必然要求和科学支撑,二者统一于实践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的全过程。

体系化是学理化的重要目标和评判标准

思想理论是现实世界状况在人的思维意识中的能动反映。科学的理论要求这种能动反映既要符合外部世界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又要体现人的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理论的体系化之所以是学理化的目标任务,正是由世界的普遍联系规律和人的思维规律决定的。在物质世界,任何事物内部的不同要素之间、任何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整个世界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规律以外部必然性的方式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而人的理论思维则以自觉的、能动的方式把握这一规律。在人类实践活动反复积累的基础上,客观世界的规律转化为主观世界的规律。整体性和系统性由此成为人的科学思维的内在特性,成为评判思维把握外部世界的程

度和水平的重要标准。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其科学性是以深厚的学理性为支撑的。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问题的深入探讨,并没有单纯停留于对某个概念和某段思想史的考证,而是将它们置于为人类寻求解放的思想主题之中,并服务于揭示人类社会规律的理论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组成部分,既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形成结构严谨的有机整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成熟的显著标志。

体系化对于把握理论整体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没有系统完备的体系建构,学理化研究就可能成为不知整体的“盲人摸象”,迷失方向的自说自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各领域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都要放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来认识和把握,避免碎片化、片面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新时代

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既要注重从学科和学术的视野阐幽发微,更要以体系化为前提和方向。一方面,要在现有理论体系中对所研究的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定位,把握其地位和功能,明确学理化研究的思想坐标;另一方面,要以系统观念把握具体的概念、范畴、命题,使之转化为有机整体,服务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学理化是体系化的内在要求和科学支撑

形成体系是理论成熟定型的显著标志,但体系化不是轻而易举、随心所欲的。马克思深刻指出,整理复杂多样的议题和材料应当避免“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深入严谨的学理研究是深刻完备的体系建构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就是对复杂的理论问题、历史事例以及相关资料冷静而深刻的钻研为基础的。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为例,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刻批判,辩证法这一合理内核才从唯心主义的封闭体系中剥离出来,成为把握社会矛盾运动和形态演进的科学方法,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对“劳动二重性”“劳动力商品”“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积累”等范畴的思想史批判和原理性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才被深刻揭示,剩余价值学说才成为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提出了建构理论体系的科学方法,即“研究

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前者意味着用科学的方法充分占有材料,如用概念思维来把握经济现象,用矛盾分析法来研究经济关系,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来把握社会发展进程;后者意味着在对现实社会的经济表象进行合理抽象,对不同经济范畴的内在关系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使社会现实运动在思维中具体地系统地再现出来,从而使材料呈现为“先验的结构”。这一方法对于以学理化研究推动体系化建构具有指导意义。

学理化是彰显理论的彻底性和深刻性的关键所在。没有深刻的学理化阐释,没有对实践实际、史料史实、原著原理的深入分析,体系化建构就可能脱离实际、流于形式,成为空洞概念的堆砌或教条化的框架。新时代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必须以扎实学识、厚重学养、良好学风为基础,从政治的高度、思想的锐度、经典的厚度、历史的深度中掌握学理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以概念的清晰性、命题的严谨性、逻辑的自洽性和思想的完备性推动理论体系的建构。

增强促进体系化和学理化有机统一的方法论自觉

如果说理论是有机的生命体,那么体系就是骨骼,学理就是血肉,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就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提升理论创新的方法论自觉。

突出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是体系化建构和学理化阐释的起点。只有直面问题、直击矛盾,理论研究才能“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有效发挥思想照亮现实的作用。当代中国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宏伟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然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在客观上为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应强化问题意识,积极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在研究真问题和真研究问题中把体系化建构和学理化研究贯通起来,不断提升理论创新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强化概念思维。理论是对现实的能动反映。现实只有转化为概念,才能成为思维的对象。而只有当思维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概念对现实的把握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因此,推动理论创新,离不开对现实问题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也就离不开概念思维。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突出概念思维的关键在于抓住标识性概念,因为其既是理论知识地图的关键“地标”,又是一种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标志。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就要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党的自我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标识性

概念进行深入研究,使其成为体系化建构之“纲”和学理化阐释之“纲”,不断提升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深刻性和辨识度。

坚持系统观念。如果说科学发现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标识性概念研究是理论创新的枢纽,那么,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就是理论创新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要把理论研究中遇到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转化为逻辑严密科学体系,就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而必须全面、系统地予以把握。一是突出整体性视野,以根本主题为指引,以宏观结构为框架,把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思想要素合乎逻辑地纳入理论建构的全局之中,防止零散化和片面性。二是强化贯通性研究,坚持逻辑与历史、抽象与具体、理论与现实相统一,使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各步骤、各环节合理衔接,防止断裂化和孤立性。三是注重提炼思想精髓,抓住规律性认识这个关键,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四是形成开放性思想空间,坚持“两个结合”,既注重用理论照亮现实、用现实激活理论,又注重用理论提升文化、用文化滋养理论,在理论与现实的相互映照、理论与文化的双向滋养中,拓展理论创新的实践路径与文化意蕴。

(据《光明日报》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培育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形势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李梦云

人才是第一资源,文化人才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育人才、建队伍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统筹各类人才培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对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and 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培育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形势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信息技术已成为影响文化创新创造的关键变量,急需培育熟练掌握信息技术、善于运用信息技术的跨学科复合型高水平文化人才。目前,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存在培养体系与数字信息业态发展脱节、产学研融合程度不足、供需匹配度较低、人才评价体系滞后、适应新型文化业态岗位与技能需要的人才缺乏等问题。“十五五”时期,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从精准把握人才需求导向、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生态等方面入手,培育、汇聚和壮大一批既深谙文化生产创作又掌握前沿技术的多层次、复合型人才。

坚持需求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明确需求方能有的放矢。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精准把握文化人才需求导向,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配性。导致当前文化和科技协同创新力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动力不足、文化领域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与装备还未实现自主化等突出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与科技融合型人才短缺。要系统谋划文化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推动文化人才强化融入技术发展的意识、提升驾驭技术的能力、开拓应用技术的场景,更好解决文化与技术脱节问题,实现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使人才培养真正服务于文化数字化战略目标的。可建立文化需求监测机制,依托信息技术工具精准识别和分析文化产业中的新兴岗位能力需求、技术应用趋势与人才缺口,将文化领域中技术应用的痛点、堵点与具体需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的靶向目标。明确不同层级与不同类型文化人才的能力以精准匹配,比如,对基础人才侧重信息工具使用培训、对领军人才强化技术创新与文化融合的战略思维培养等。通过信息系统建立需求反馈闭环机制,持续跟踪文化人才在技术应用中的适配情况,确保需求导向始终贴合技术赋能的实践场景,实现文化为科技铸魂、科技为文化赋能的双向奔赴。

优化培养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培育兼具人文素养、技术运用能力与跨学科整合能力的高水平文化人才,推动教育变革是关环一环。面对这一复合型人才要求,传统文化人才培养模式在学科划分、课程体系、教学范式等方面存在滞后性,理论教学与实践“两张皮”、跨学科交叉融合培养不足等现象比较突出,亟待系统性推进文化人才培养体系创新。要构建分层分类、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体系。鼓励各类教育主体立足实际,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强化信息化课程教材与师资建设。构建贯穿全程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在基础教育到继续教育的各阶段系统融入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数字素养通识课程,开展多层次、模块化数字技能培训,提高文化人才技术应用能力与跨学科整合能力。推动围绕文化数据治理、数字文化新业态等前沿方向开展协同攻关,进一步将实验室里的技术专利与算法模型转化为推动文化建设的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实际应用。构建一批具有示范性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使其在实践中融会贯通、锤炼本领。完善协同机制,打破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壁垒,积极推广“政府—高校—企业”多方协同的培养模式,建立“政产学研用”联合育人机制,依托“双师型”导师队伍的传帮带作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赋能,弥合学校教育与实践需求的鸿沟。

营造良好生态。制度环境是人才汇聚与成长的土壤。信息技术迭代更新的快速性与文化价值沉淀的长期性,要求文化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必须具备足够的敏感性与包容性。目前,适应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协同管理机制尚不完善,鼓励创新的评价标准与激励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需从制度供给、政策扶持、评价激励、融合发展四个维度精准发力,形成协同推进的良好生态。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厘清文化领域运用信息技术的界限范围与伦理底线,界定数字文化产品产权归属,规范收益分配方式。进一步完善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容错纠错机制与监管体系,既为文化人才的技术创新松绑,又筑牢风险防控底线。完善政策扶持机制。为符合条件的文化科技企业、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提供资金补助、税收减免等政策红利。健全要素支撑与人才评价体系。以科学评价为导向。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标准,鼓励文化人才主动拥抱新技术,充分调动文化人才创新创造的积极性。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加快推动新型文化业态高质量发展,拓宽文化人才发展空间,赋能文化精品生产。

(据《人民日报》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

重塑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双赢思维 推动自治区首府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杨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他强调:“要坚持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统筹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这是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对发展与安全的综合考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和生态稳定,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始终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通过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中国成功找到了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推动实现了发展与保护的共赢。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强调:“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是自治区党委和市委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排部署,推动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双赢互促的实践要求,为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实现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导。

探索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双赢路径的重要意义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探索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路径是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全面践行。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般都陷入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不仅造成资源枯竭、环境退化,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双赢路径强调将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最宝贵的生产要素,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从高耗能高排放向绿色低碳转型。这要求我们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绿色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改善的协同并进。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相互促进的关键抓手。高水平保护通过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和生态系统功能修复,倒逼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推动形成绿色产业、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等新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高质量发展通过经济效益、技术创新与完善的制度机制为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技术支撑和法治保障。双赢路径打破了“保护即限制发展”的误区,推动形成“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强保护”的良性循环,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体现与时代使命。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双赢路径的本质是以经济发展效益反哺巩固生态治理成效,以优质生态环境与生态资源赋能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实现“绿起来”和“富起来”的互促融合。双赢路径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

自治区首府探索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双赢路径成效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自治区首府因地制宜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打造“绿富同兴”的样板。一是做强“生态+文旅康养”产业。依托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敕勒川草原文化旅游景区等资源,构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完善纵向转移支付与差异化补偿,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层面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加强黄河、大黑河、大青山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力度。二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交易。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依托自治区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将大青山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的“无价”生态服务功能进行“有价”量化。三是探索开展资源环境权益交易。通过探索开展林业碳汇、水权、排污权等权益交易,将抽象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变现的经济要素。使地方和企业从被动的“要我保护”转变为主动的“我要保护”,从而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给钱、给物、给牛羊的做法,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方式,不包大揽,不包办代替,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自治区首府合理

制定并深入实施以工代赈机制,实现“生态修复”与“富民增收”的双向奔赴。一是拓展以工代赈实施领域。在传统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推广以工代赈的基础上,将其延伸至生态修复、防沙治沙、矿山修复、环境整治等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例如,在实施大青山生态综合治理、敕勒川草原修复等项目时,明确用工比例,优先吸纳当地农牧民和低收入群体和因灾滞留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二是强化技能培训与就业转化。坚持“授人以渔”,在组织实施“以工代赈”过程中,开展林业技术、绿化施工、生态管护等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上岗”的模式,将普通的零工培养成懂技术、会操作的生态产业工人,推动其实现从短期务工向长期就业的转变。三是创新利益联结机制。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直接承接以工代赈项目,让农牧民不仅获得劳务报酬,还能通过入股分红、资产折股等方式分享工程建设的增值收益,确保生态治理红利更多惠及当地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自治区首府因地制宜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打造“绿富同兴”的样板。一是做强“生态+文旅康养”产业。依托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敕勒川草原文化旅游景区等资源,构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完善纵向转移支付与差异化补偿,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层面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加强黄河、大黑河、大青山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力度。二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交易。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依托自治区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将大青山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的“无价”生态服务功能进行“有价”量化。三是探索开展资源环境权益交易。通过探索开展林业碳汇、水权、排污权等权益交易,将抽象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变现的经济要素。使地方和企业从被动的“要我保护”转变为主动的“我要保护”,从而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给钱、给物、给牛羊的做法,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方式,不包大揽,不包办代替,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自治区首府合理